宏观观察

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

□赵振华

编者按：稳增长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稳增长可以为调结构留下回旋余地；调结构是为了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调结构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稳定增长。因此，要在矛盾的统一中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一战略举措，可以从三方面来认识。

稳增长就是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随着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和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提高，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新常态，超高速增长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经济增长率也不能太低，而是要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

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意味着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不意味着在当前阶段要进入中低速增长，更不是低速增长和不增长。只要是集约的、有质量的、可持续的增长当然是要追求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其基本前提之一是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世界人均GDP为10281美元，同年中国为6091美元，较世界平均水平低约40%。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落后的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的办法来解决。

保持中高速增长才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客观上要求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前，还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速度。伴随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总体上会呈现由高速、中高速、中速、中低速、低速等发展趋势。况且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难免会遇到内外部不可控因素的影响，高速阶段也会出现低速增长时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1979年到2013年我国年均增长率为9.8%，但是若从年度数据来看，有9个年份低于8%，因而客观上要求在当前一个时期，需要保持中高速增长。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经济方面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2010年我国GDP总量为40.15万亿元，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要达到80.30万亿元，要实现这一目标从2014年到2020年的7年时间需要保持约6.8%的经济增长率。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则需要分别达到38218元和11838元，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2014年至202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同样需要达到约6%。要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两年时间，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将国民经济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区间，相应地要求明年要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强刺激强紧缩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的大幅度波动。同时，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要实现新中国成立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然我们要追求的经济增长是有质量的速度、更加注重环境保护前提下的速度、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前提下的速度。

调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居民需求在不断升级，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结构调整的过程就是不断优化和升级的过程，永远在路上。不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要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取胜，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是不二选择。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等。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着十分繁重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任务。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存在大量落后的过剩的产能，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第一产业基础不稳固，第二产业竞争力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从区域结构来看，近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但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过大，区域经济不协调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时区域内部差距也有拉大趋势，东部既有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甚至还有贫困县和贫困乡村；西部总体欠发达，但也有发达地区。从城乡结构来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十分突出，有人形容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我们既面临着推动城镇化又面临着建设新农村的双重任务，从城镇化来看，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刚刚超过农村人口，也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未来我们既要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的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我国的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即使完成了城镇化，依然会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建设新农村的任务同样十分繁重。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来看，消费需求依然乏力。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从不发达向发达过渡的过程中，无不都在不断地优化经济结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三二一，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比重都已经超过70%，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三大产业的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代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最新发展趋势的信息产业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信息产业与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深度融合。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不断培育新兴产业，淘汰落后产业并实现产业内部的协调。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优化区域结构，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推进城镇化，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实现了城乡一体化；消费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面对来自国内外诸多压力，唯一的出路在于调结构，通过结构优化，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良性互动

一是要辩证地认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相互矛盾的一面，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从矛盾的一面来看，调整产业结构，就意味着要以技术更先进的产业代替落后产业，落后产业淘汰的过程必然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而要稳定经济增长，或多或少会要求放慢调整经济结构速度，之所以欠发达地区调整经济结构难度更大，很大程度上在于稳增长的难度大。从相互促进的一面来看，调结构的目的是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能够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稳增长特别是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为调结构留下回旋余地，因为，调结构在短时期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在矛盾的统一中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平衡，要在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停滞中实现结构调整，通过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调结构的前提是稳增长，没有经济的稳定增长就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利润率攀高的时候，微观经济主体必然没有调结构的动力，在既有的结构下企业仍能获得很高的回报；当国民经济低速增长，企业利润率走低甚至亏损的时候，大量劳动力失业，政府面临着增加就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只有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时候，企业既面临竞争压力，不得不促进技术进步，政府促进就业压力相对降低，才能够形成调结构的政策环境。因此，我们需要在稳增长中调结构，在调整经济结构中实现稳定增长。

二是要有战略定力。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因素，需要拨开迷雾，不为一时一事所困扰，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就稳增长与调结构来看，在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没有突破底限时，就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加快调整经济结构的步伐，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换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是值得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的，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这也正是调结构的根本目的。不能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就惊慌失措，在宏观调控中搞“大水漫灌强刺激”，为增长而增长。

三是要促进科技创新。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平衡的切入点是科技创新。一方面，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要实现在结构调整中的经济增长，关键是实现科技创新，既可以培育一大批新兴产业，只有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高于落后产业淘汰的速度，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也可以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另一方面，科技创新也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没有科技进步和创新就谈不上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落后产业的实质是技术落后。实现科技创新需要形成政府、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协同创新的机制，关键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连接起来，这就是企业出题目，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做文章。

经济体制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本报记者 杨志梁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大块头、高速度、多变化’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要靠自己探索。”在第12届中国改革论坛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李铁映同志在论坛贺词中明确指出。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又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第12届中国改革论坛（2014）日前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回顾总结一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研究谋划了新一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方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建言献策。

全面深化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指出，我国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十个方面的进展。第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度推进，有力地激发了市场活力；第二，工商登记制度改革配套推进，充分释放社会创业潜力；第三，投资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进一步凸显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第四，财税体制改革扎实推进，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第五，金融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第六，资源性产品等价格改革深入推进，不断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第七，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改革稳步推开，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第八，涉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发挥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良好成效；第九，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继续深化，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第十，生态文明制度改革扎实推进，为“美丽中国”建设完善制度保障。连维良最后指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大政方针已定，改革到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实施操作阶段，需要改革工作者发挥专业主义精神，同时要开门搞改革，广集各方智慧。

通过深化改革适应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并设立了强有力的改革领导“中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强有力推进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目前亟需解决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重大问题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促进财政资源有效配置；积极稳妥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全面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时，就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方针。靠法治为改革护航，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以法治作为改革的压舱石，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彭森还指出，今年是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的一年。一方面，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仍处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增长稳中趋缓、稳中有忧、稳中有险。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改革开放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重点任务也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倒逼机制将发挥更大作用。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中编办副主任王峰阐述了过去一年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认为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取得主要成效是：一是推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二是推进政府转变职能明显提速。三是促进政府作风明显改善。他还提出当前深化行政审批制度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从已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看，有的领域存在放小不放大、放虚不放实、横向不同步、纵向不衔接等现象，有些市场主体和公众对改革的实际感受还不明显；二是国务院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实施审批的效率较低，进一步取消、下放和规范审批事项的任务依然较重；三是事中事后监管急待加强和改进；四是如何正确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尚需深入研究；五是地方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遇到“天花板”。

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孔泾源从转变政府职能、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放松价格管制、城镇化和统筹城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体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八方面深入阐述了20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指出体制改革有力地支持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稳定增长和提质增效升级，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财税改革将作为重头戏拉开全面深化改革的帷幕。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指出，财税改革的重点在于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和优化调整中央地方体制等三大领域。

加快非公经济改革推进创业创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存在不平等。推进创业创新潮流的形成，必须改变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主体的市场地位不平等的现状，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他同时指出，当前创业和企业成长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融资困境，必须推进金融改革，并对金融改革提出六条建议。一要超常发展草根金融。二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三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四要积极发展政策性金融。五要显著提升直接融资的比重。六要完善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体系，使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互动，让资本市场惠及科技型中小企业。

发展混合所有制需要分类实施。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会长宋晓梧认为，混合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是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指的是出资主体多元，而股份制指的是资本的组织形式。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产权组织方式。他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的两个作用是：第一，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利于政企分开。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进一步激活国有资本活力。同时他认为，凡是竞争性质的企业，都可以实行两种所有权相分离，让它们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那些还不具有竞争性质或带有垄断性质的企业，两种所有权可不分离，仍由国家经营。

践行依法治国精神需要建立良好制度规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制度是规范人与人利益关系的一套规则，其逻辑假设前提是“人之初，性本恶”。好的制度不仅体现公平正义，还要便于实施，有效可信；好的制度从本质上说必须不具有任何“排他性”，能够被所有在这一制度下生活的人所“消费”，并且是强制性地“消费”。从制度应用于公权和私权的角度看，对于公权而言，要用“正面清单”约束，凡是没有规定你可以做的，都是不可以做的，不可“创新”地扩大政府的审批与干涉；而对于私权而言，要用“负面清单”管理，凡是没有规定不可以做的，都是可做的。好制度的标准在于是不是明确而清晰地界定各方的权利与责任，涵盖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以及是否有简单明了的处理问题的程序。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应当用制度而不是道德去抑制腐败。

经济时评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与政府改革

□李万峰 汪 彤

新一届政府的执政思路与施政重点体现在促改革、稳增长、惠民生等方面。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地产周期、资本支出、库存周期共同向下的压力，处在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时期。未来十年，政府改革进展、创新持续推动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与效率提升。

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改革是新一届政府提到次数最多的议题，既涉及简政放权的行政体制改革，也涉及中期预算、“营改增”的财税体制改革，利率市场化的金融改革，还涉及农业改革、铁路投融资改革、养老服务改革等。通过全方位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改革的作用，现有一些改革措施、方案、试点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李克强总理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从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来看，这是为经济的创新周期提供有利条件，也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加快改革的决心以及“向改革要红利”的意图。

稳增长方面，新一届政府长短兼顾。2013年6月，面对钱荒传言，政府没有盲目出手，而是力图以金融之手，通过市场调节，“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央行行为方式的转变，折射出了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思路的变化。政策重点不再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增长，而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挤出在影子银行与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消除制造业产能过剩，从而真正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目标。同时在短期，本届政府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在光伏产业遭遇困境时，政府及时出手。因为中欧光伏贸易争端影响到中国上千家企业的生存和40多万人就业，这一举措关系社会稳定。以上几点可以发现，新一届政府决策不是重在应急，而是强调长短兼顾，试图努力在治标的同时，把治本的长效机制建立起来。从经济学思想的角度来看，政府一方面可借鉴伯南克和明斯基的思想，重视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波动的控制，并加强对金融体系风险的监管；另一方面仍可借鉴凯恩斯的思想，在经济周期有下行危险时，及时适度地干预经济来稳定就业。

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一届政府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基本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部署，试图织就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安全网。加快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不仅是民生工程，也是补上服务业短板的大好时机，符合调结构、促转型的发展方针。同时，我们强调的发展服务业，侧重于现代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当然，改善民生还包括环保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这两大问题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发力点。从经济周期的思想来看，新一届政府在改善民生时，应以全新视角和思维，有针对性地选择社会领域的薄弱环节，加大投资力度，一方面能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又能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争取把宏观决策时的“两难”变成双赢甚至多赢。

房地产周期的下行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对冲？如何转型？实际上就是如何使得经济平稳回落的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减速的要件，一是创新演进，二是政府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改革。

第一，必须避免房地产价格出现明斯基时刻，即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城镇化的开启确实为房地产提供了客观条件。2013年2月以来房价环比增长见顶，随后持续回落，但环比增长尚未出现负数。地方政府在此时点已经开始想方设法稳定房市，中央政府也推动市场无风险利率下行，从本质上也是为了避免房价出现明斯基时刻。我们理解，明斯基时刻在现代经济中出现的频率在降低，原因是政府调控增多。在城镇化下半场中，房价高增长的预期会降低，而收入增速仍能保持，房价相对于普通大众的收入会变得更加合理。房价会出现分化，即一、二线城市仍将上涨，但三、四线城市会出现下跌，政府需要组织好产业、基建和人口的布局。

第二，政府改革是决定在经济换挡期平稳发展的关键。政府和国企将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政府改革可以使得政府效率更高、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奥利地学派的“无为而治”所需付出的社会成本过高，而过强的“凯恩斯主义”则使得政府背负过大的债务，因而“定向凯恩斯主义”可能更为适合转型期政府。同时，政府支出进一步从建设转向民生，教育、医疗、社保、环保、失业保险等支出比重将不断上升。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那些新崛起的行业，包括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国企仍将是重要的组成力量，但前提是国企改革的推进。

第三，促进创新演进。创新周期是长达50~60年的长周期，但是创新一定是爆发式的，而非平稳式的。按照十年一个创新爆发期而言，2010—2020应该是这样的科技创新爆发期，未来3~5年是重大机遇期，包括互联网、通信、新能源等，都在出现重大突破。政府和金融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源倾斜，包括政府R&D投入、给予高科技企业更多优惠，以及金融体系给予高科技企业上市更多的便利等，都对中国的创新演进至关重要。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包括高新技术领域的产能过剩，比如光伏；包括现在崛起的互联网企业普遍被外资所控股。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这一轮创新演进中有所规避，尽管这很难。

房地产增长的回落是历史客观规律，本身不是坏事，潜在增速的下降不应回避。从经济周期理论来看，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是逐步探底回升的十年。只要规避房地产市场的明斯基时刻，遵循“定向凯恩斯主义”道路，在熊彼特的大创新周期中促进创新的演进，做好政府改革，让政府在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金融体系更好地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为新兴产业服务，未来仍能穿越牛熊，实现白银十年。